

中日技術合作的背後

——我所了解的日本JICA人

周冬霖 著

Inside Story of Technical
Cooperation of China and Japan



天津教育出版社
TIANJIN EDUCATION PRESS

中日技術合作的背後

——我所了解的日本JICA人

周冬霖 著

Inside Story of Technical
Cooperation of China and Japan

天津出版集團天津教育出版社 天津出版集團天津教育出版社

天津出版集團天津教育出版社

天津出版集團天津教育出版社

天津出版集團天津教育出版社

天津出版集團天津教育出版社

天津出版集團天津教育出版社

天津出版集團天津教育出版社

天津出版集團天津教育出版社

天津出版集團天津教育出版社

天津出版集團天津教育出版社

天津出版集團天津教育出版社

天津出版集團天津教育出版社

天津出版集團天津教育出版社

天津出版集團天津教育出版社

天津出版集團天津教育出版社

天津出版集團天津教育出版社

天津出版集團天津教育出版社

天津出版集團天津教育出版社

天津出版集團天津教育出版社

天津出版集團天津教育出版社

天津出版集團天津教育出版社

天津出版集團天津教育出版社



天津教育出版社
TIANJIN EDUCATION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日技术合作的背后：我所了解的日本 JICA 人 / 周冬霖著.

—天津：天津教育出版社，2010.3

ISBN 978-7-5309-5992-3

I. ①中… II. ①周… III. ①人物—生平事迹—日本—现代
IV. ①K833.1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035731 号

中日技术合作的背后——我所了解的日本 JICA 人

出 版 人 胡振泰

作 者 周冬霖

选题策划 陈志平 蒋丰祥

责任编辑 贾永来

装帧设计 袁 畅 蒋敏捷

出版发行 天津教育出版社
天津市和平区西康路 35 号
邮政编码 300051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洛阳报人印刷厂
版 次 2010 年 3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0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规 格 16 开 (787 × 1092mm)
字 数 200 千字
印 张 23.5

定 价 39.80 元

谨以此书献给

日本对中国开发援助 30 周年
来华工作的 7000 多位 JICA 人

前 言

2008 年是中国改革开放 30 周年，在北京举办了很多纪念活动。其中，中国的“日本圈”里的专家们也举办座谈会，回顾 30 年以来中日合作对中国改革开放的影响，列举了很多“日本因素”对中国经济建设进程的积极作用，许多亲历者和研究者言之凿凿，谈起许多令人感慨万千的“往事”。在此前后，许多老领导陆续发表或出版了一系列回忆和纪念文章，回顾了改革开放国策制定的前前后后，终让普通百姓也有机会了解到那一段历史。还有，我最近几年在“非主流”的书摊上“淘”了不少 1980 年前后出版的图书，比如当时的国家经济委员会赴日考察组编写的《日本工业企业管理考察》；邓力群先生的《访日归来的思索》等一批旧书，如果把这些资料相互观照起来学习，回首国家进步的足迹，的确让人感到欣慰，更加坚定了信心。

自从 1972 年中日邦交正常化以后，中日在各个领域里的交流开始逐渐活跃起来。到 1979 年 12 月 5 日，时任日本内阁总理大臣的大平正芳来华访问期间，说明了日本进行经济合作的基本方针，表示日本政府准备根据中国的愿望，进行积极的合作。大平首相代表日本政府重申，全面支持中国改革开放的政策，愿意在经济、教育、





文化等广泛领域，提供物资和人力方面的资助。从此，中日经济合作迈入一个新的历史时期。

以此为开端的日本对中国经济开发援助（ODA），最早从有偿资金合作（日元贷款）开始，逐步发展到无偿资金合作、技术合作等多种形式。在迄今 30 年的中日经济技术合作中，有偿资金合作主要用于我国铁路、港口、发电厂等基础设施建设方面；无偿资金援助主要用于农业、医疗、环境等社会事业领域和人才培养计划；技术合作则涵盖了农、林、水、教、科、文、卫及工业、经营管理、生态环境等广泛领域。

由日本国际协力机构（JICA）具体负责的中日技术合作实施 30 年来，在配合有偿资金合作和无偿资金合作项目的同时，以开发调查、人才派遣、研修与交流等形式进行的技术合作项目，先后派遣到中国来工作的各类专家人数达 6852 位；接受了中国的 22984 名有关技术人员到日本研修。纵观对华 ODA 实施的整体情况，这无疑是既“授人以鱼”，又“授人以渔”之举。

在百废待兴的特殊时期，中国要发展，缺资金更缺人才。而当时的日本有很多方面走在我们前面，成为值得我们学习借鉴的榜样。1981 年，在邓小平同志的倡议下，中日经济界著名人士共同发起举办的“中日经济知识交流会”，成为我国引进日本智力、学习日本发展经验的一个重要渠道。时至今日，中国改革开放 30 年来的实践证明，中日经济技术合作，对中国自身经济发展和维护东亚地区的和平稳定，所起到的积极作用是有目共睹的。

我从 1999 年离开新闻界开始从事中日交流工作以来，有机会接



触了大量的日本对华援助项目，陆续结识或了解了很多来中国工作、实施 ODA 项目的专家和工作人员。他们本来是“受日本政府派遣来中国完成工作任务的”，但是在与中方合作单位及与中方对口专家的接触中，他们深切地感受到中国人的友善与真诚，体会到他们拥有的智慧可能释放的效应，这也大大激发了日本专家的积极性，使很多日本专家在工作中并不仅仅“当一天和尚撞一天钟”囿于“完成任务”，而是带着责任感和成就感，使中日合作项目最大限度地产生连锁效应。

本书所收录的 20 篇文章，主要介绍的是由 JICA 派遣来华从事中日技术合作项目的近 50 位日本专家，涉及的相关人士多达百余人。他们当中，有在中日友好医院、中日青年交流中心、中日友好环境保护中心等重点合作项目中辛劳工作的日本专家，也有在八桂壮乡、川西北高原等条件艰苦地区默默从事农村卫生普及、职业教育和乡村开发扶贫项目的日本青年海外志愿者；有为了中国的碧水蓝天和荒漠新绿而呕心沥血的环境专家，也有在农业、林业、水利、冶金、矿产资源开发等领域科研攻关的科学家。这些日本朋友，作为 ODA 技术合作项目的专家，中日友好的使者，他们肩负着中日友好合作的重任，带着日本人民对中国人民的深情厚谊，以满腔热情活跃在中国的各行各业，把自己的聪明才智贡献给了中国，以实际行动和显著的业绩，在中国的改革开放、经济发展、现代化建设史上，谱写了新时代的中日合作新篇章。

他们的无私奉献精神，感动着参与项目合作的中国人；他们精益求精创造的卓越成绩，也得到了工作单位和有关部门的承认和称



赞。本书所介绍的 JICA 专家中，就有 19 位获得过中国政府“友谊奖”；3 位获得了卫生部表彰；10 多位分别获得了工作所在地省级人民政府或归口部委的奖励与表彰。

据有关资料，从 1991 年至 2009 年，有来自 60 个国家近 478 万人次的外国专家前来中国工作。其中，有 1099 名专家因对中国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做出突出贡献，获得中国政府授予的“友谊奖”。这其中，日本专家以 210 多位的获奖人数位居国别第一。此外，在中央政府各部委和各省级人民政府设立的针对外国专家表彰的奖励奖项中，日本专家的获奖人数也位居榜首。2008 年有关方面评选出 15 位“改革开放 30 年中国最有影响的海外专家”，日本专家占 3 位。2009 年，外国专家局为纪念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60 周年评选的 60 位外国专家中，日本专家占 9 位。这些，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中日之间友好与合作的密切程度。

从 2008 年日元贷款宣告结束之后，日本对华 ODA 并没有结束。

作为 ODA 重要组成部分的中日技术合作依然在中国存在。比如，2008 年“5.12”大地震之后，由 JICA 负责组织实施的日本国际紧急救援队、日本国际紧急救援医疗队，以及灾后恢复重建中一系列援助合作项目的实施，由 JICA 负责的对华技术合作其他项目也都在正常进行中。我们相信，中日技术合作在今后一个时期内，仍然会以其独特的形式发挥着应有的积极作用。

中国从一个需要接受援助的国家逐步成长起来，它反映了中国经济持续增长的成就，显示了中国奔向小康社会的稳健步伐。然而，无论从中国当前的人均收入水平、从东西部地区之间的巨大差距看，



还是从中国要走出一条低耗能、环境友好的新型工业化道路来看，显然都离不开包括日本在内的国际社会的合作、支持与帮助。

无论是 ODA 项目下的中日经济合作，还是其他形式的中日经济合作，从历史和发展的眼光看，中日经济合作是有利于两国利益的互惠互利的必然选择。通过中日合作，积极引进为落实科学发展观所急需的节能环保技术，促进扶贫和教育事业发展，有利于中国的现代化建设，也对中日合作共赢具有积极意义。

最后需要说明的是，日本专家在中国的活动和成就并非我的几篇拙文所能够完全展现的。加之本书在采写过程中由于各种客观条件限制，仅仅是“一贯之见”，是从“我了解”的一个侧面提供的参考，不妥之处还请多多批评指教！

周冬霖 2009 年 2 月于北京

目 录

八岛继男和他的伙伴们	1
塔克拉玛干情缘	33
又见树木,又见森林	55
在中国行走江湖	68
写在中国土地上的报告书	84
JICA 理事长奖	103
“大同”的“高见”	117
黄土高原双雄会	126
“四湖”五年之后	137
润物细无声	152
寻找宝藏的金钥匙	165
山城轻轨云中行	172
钢铁的缘分	183
柯树籽学园在中国	216
爱洒残疾人	232





青春热心 情暖凉山	242
八桂绣球抛东瀛	268
一波三折的故事	288
日本计划生育在中国	303
三人行,必有我师	327
患难之交情亦真	334
附录一 政府开发援助概要	354
附录二 日本国际协力机构(JICA)事业概要	356
后 记	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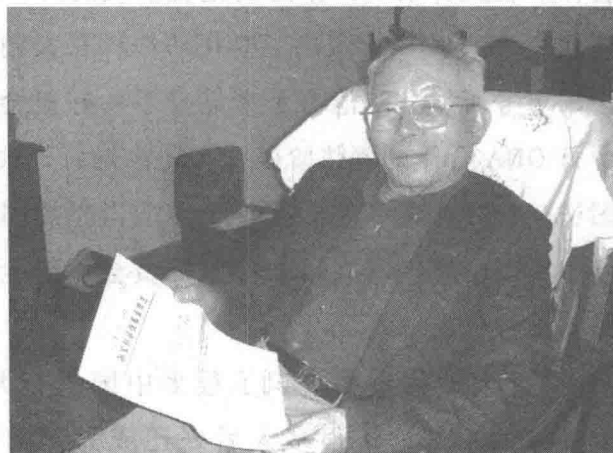
❧ 八岛继男和他的伙伴们 ❧

八岛继男是日本国际协力机构（JICA）中国事务所的首任所长。
八岛继男也是中日技术合作项目在中国的拓荒者。

从东京到北京的往事

1982年3月，八岛继男受JICA总部委派只身从东京来到北京，出任JICA中国事务所首任所长，着手筹办中日技术合作。谈及当初在中国开展工作的情形，八岛先生说，有中方窗口单位国家科委（今科技部）的帮助与支持，开展工作都很顺利，几乎一路绿灯，没有遇到过任何能称之为坎坷和不顺利的经历。

“有一个插曲，现在回想起来很有意思。就是在我刚来到





北京，在海关领取我从日本托运来的汽车的时候，当时文件上写的是‘一个工作人员可以带一辆汽车’，而我托运的是两辆。我解释说‘一辆是我自己的私家车，一辆是单位的公车’。但是当时的单位就只有我一个人，所以这个概念让办事人员有点发懵，他为此最后打了很多咨询电话，才算把‘公’和‘私’的问题搞清楚。”

是啊，那时处于半封闭的中国刚刚结束“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实行改革开放不久，一切涉外事务都处在逐步恢复初期，几十年一以贯之的计划经济正在转型，而日本，早已进入了发达国家的行列，让迈出国门的邓小平副总理在日本的新干线上感叹“知道了什么是现代化”。

1978年8月，《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缔结；11月，邓小平访问日本时，首次正式表示中国可以接受日本的政府贷款。

1979年12月，日本国内阁总理大臣大平正芳访华时宣布，为支持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日本向中国提供日元贷款和技术合作。在此背景下，作为实施日本政府开发援助（ODA）项目主要机构之一的JICA，派出了时任研修课长又精通中文的八岛继男出任中国事务所长，使他有了大显身手的好机会。到中国工作之前，在中日ODA合作的预热阶段，八岛曾先后3次随日本政府代表团来中国访问；并在东京多次接待了中国当时的国家计划委员会、国家经济贸易委员会、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卫生部、公安部、共青团等很多访日代表团。

“最大的收获是结识了很多中国人，大都是当时在中国各部委工作的干部，有很多人后来还成为好朋友！”说这句话时，八





岛一脸灿烂。他说，“比如朱镕基、袁宝华、张彦宁、李源潮……三十年就这么一晃就过去啦，那时候，他们可都是风华正茂的年轻干部啊”！

正是来自各方面的支持，让八岛继男在中国的工作颇为顺利。当然，那时候中国的条件毕竟有限，开拓性的合作还是面临着很多周折的。

当时，八岛从机场入住北京西郊的友谊宾馆，一住就是一个星期。如今以“中国硅谷”闻名世界的中关村，在当时却是僻静得近乎荒凉的城乡结合部。八岛最急于解决的问题，是自己的住处和办公的房子。在当时，中国的字典里压根儿没有“商品房”这个名词，面对偌大个北京城，即使你掏再多的钱，就是租不到合适的房子。那时的房源短缺程度，今天的人们难以想象，符合外国人使用条件的房子更是难以接受。

没办法，日本驻中国大使馆临时给了他一套办公桌椅，算是有了“蜗居”之地。“虽说都是外务省的系统，但是工作性质不一样，毕竟不太方便，那是一种……寄人篱下的感觉。”因此，一个时期以来，八岛白天的主要工作还是找房子。

在国家科委的安排下，八岛与中方负责外国机构服务的窗口单位北京市外交人员服务局开始具体的联络。八岛一个日本人却操一口流利汉语，所干的工作又是来帮助中国搞经济建设，服务局的负责人对他颇有好感，答应“尽最大的努力最快的速度帮助解决”。

果然，一周之后，服务局提供了一套条件很好的住房。

因为此事，八岛和服务局建立了更加密切的人际关系。服务局





很快在半年之后的11月，在三里屯外交公寓又一次给八岛“调剂”了一间50平米的办公用房，并且主动把服务局的单位车库特别提供给八岛使用。“在以后的几年里，服务局每年都会给JICA至少一套房子，提供给来中国工作的日本专家使用。这在当时，那的确是很了不起的待遇啊。”

伴着爽朗的笑声，八岛饶有兴趣地谈及往事：“在那个年代，北京的房子是非常紧张的，就JICA的业务来讲，很多技术合作项目的开展，都需要派遣日本专家来中国工作。短期专家来华工作可以临时住在宾馆，可长期专家来了就没有办法解决，因为他们一般要工作好几年，而且大都是举家来中国的。针对这种情况，我就建议中方申报项目的机构，在项目预算中把专家公寓也作为一个支项目列入其中，通过这样的努力，逐步缓解了中日合作项目的专家住房问题。”

中国方面的有关人员回忆这个话题时也介绍说，八岛先生多年来，总是能够根据自己对中国国情的了解和经验，充分利用JICA的合作政策，在各个项目的实施中，考虑到中日双方的实际情况，有针对性地开展建设性的工作。

三十六年前的故地重游

1985年8月，在前往黑龙江省双鸭山地区的宝清县考察项目的途中，八岛继男特地提出要求访问沿途路过的延寿县。

哈尔滨市所属的延寿县，地势奇伟，玛延河从中部斜穿而过，





南北两地皆向中部倾斜，中部又由西南斜向东北，鸟瞰地貌，其形颇似农家使用的簸箕。玛延河两岸，土地肥沃，水源充足，冲击平原上，湖泊沼泽星罗棋布，物产资源丰富。正是这诸多的优势，使当地成为近代史上政治、经济的重要据点，也使延寿人的命运多了一份坎坷。

伪满康德元年（1934年2月），出生在沈阳的八岛继男就生活在延寿县城。

八岛继男的父亲出生于明治四十年代，后来在东京国际大学学习中文。到大正时代，是日本进一步现代化的历史时期，也是向大众社会过渡的历史转型期，自由化思想十分活跃。受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在当时的日本，有很多年轻人对新的潮流很敏感，八岛父亲思想开始转向左派，因为学的是中文，当时在日本国内也没有很好的个人发展空间，所以便随殖民组织“开拓团”来到中国。从1943年到1945年日本战败投降，八岛父亲当过延寿县的副县长。

八岛在延寿县城里度过了童年和少年时光，他记忆最深的，是当时家中负责他饮食起居的一位天津籍老伯，无意间成为八岛学中文的启蒙老师。

1946年，从葫芦岛港口撤离中国东北回国的时候，八岛继男还是一个12岁的孩子。

回到日本，八岛开始了学生生涯。1964年3月，他从东京大学文学系中国文学科毕业。当年4月，他进入日本海外技术协力事业团（OTCA）工作。此后的十几年里，他兢兢业业，以工作为重。谈及那些日子，八岛觉得有点的遗憾是，自己所学的中文并没有派上



多大用场。那时，在日本使用中文的机会很有限，学汉语的人没什么“市场”，更谈不上“吃香”，就连找工作也不好找。

到了1977年8月，OTCA与海外移往事业团（JEMIS）合并，改组成立了国际协力事业团（JICA），八岛在其大阪的国际研修中心担任了研修课长。次年6月到1980年4月，他又分别担当JICA研修第二课和第一课课长。也就是在此期间，邦交正常化之后的中日两国，无论是政治、经济、文化还是民间交流都异常活跃。面对这样的形势，精通中文的八岛如鱼得水。

能够在36年之后回到延寿，是八岛继男早先没有奢望过的。

八岛眼里的延寿城尽管并不发达，但已很难寻觅36年前的踪迹了，记忆中的煤油灯早已被明亮的电灯取代。

“世界上最大的共产党在中国，共产主义的希望也在中国。苏俄是帝国主义。”——这是当年在延寿的时候，父亲告诉八岛的一番话。在当时，他似懂非懂，但记得十分清楚。待到长大成人，他才

理解了父亲那源于“日俄战争”的民族感情。今天，八岛终于有机会在这个由全世界最大的共产党领导的国度里，亲身体验父亲当年的看法。

八岛在很多正式场合表示：“中国是我的第二故乡，我小时候曾经生活在中国，所以我对中国怀有特殊的感情。我喜欢这个国家，喜欢中国人。”因此，他尽自己的努力做



八岛（左）与作者

